

東亞國際政治的新轉換點

張文蔚

亞洲國際政治的危機與轉變，最近的風雨緊張當然不是第一次。中國大陸的失陷，珍珠港的偷襲，七七事變的爆發、韓戰的警鐘等，料當時必有許多人士感到驚慌不安，汪精衛就是其中的一個。日本的東條，可能沒有在當時預料到他自己的最終命運。國際政治是千變萬化的，誰也不應盲目的抱有最樂觀的或最悲觀的算盤。唯有證諸歷史的教訓，正確的觀念，豐富的知識，和有系統的分晰，才能具體的，而富有彈性的摸縱和適應國際間的暴風雨。從複雜的國際有關因素中，充分的認識自己國家的長久利益和確立外交策略之後，然後才能靈活有效的運用外交藝術而爭取與國。任何政策決定機構必須有最好的打算和最壞的準備。筆者察覺在臺灣和東南亞有些人士對東亞國際政治的轉變抱有思路不通的牛角看法。故難免有失望悲觀的流露。這是要從學習中改正的。

外交與內政是分不開的，一個國家能在內政上大刀闊斧的求新改進，上下團結一體，犧牲建設，則其進步的成果，新生的氣象，人民的支持等，就是外交的最好援軍和後盾。東南亞部分人士的驚慌，正由於其政治貪污無效和經濟建設遲滯，就算國防安全無慮，內政上的革命動蕩也會造成政局不穩。例如我們臺灣的外交資本，亦要

再着重努力建設，務使本島在行政、社會、文化、經濟、民主等改造發展上能捷足登先，示範鄰國，剷除貧富懸殊，辦好社會福利建設，發揮青年人的才能和犧牲精神，外銷我們的民主和建設經驗，傳授移殖我們的土改和農村經濟成果，以臺灣的高度現代民主化召示亞洲鄰國，說服姑息主義，則臺灣定可克服一切敵人。國際間雖無道義而只有利害，然亦不能抹殺自強行健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發奮自愛而後人愛之。

國際間的集團政治鬥爭與外交轉變是有週期旋律性的。今天的姑息主義逆流，有似一九三六到三九年間的英法美妥協政策，也正如一九五〇年韓戰和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國在遠東的暫時觀望政策。要了解其原因我們必須從各該國保護本身既定利益的立場來判斷其未來行動，不應從外交權術棋步上盲作定論。並應從民主國家內政的轉變和壓力上，來了解民主外交的特性。例如英法在第二次大戰前夕的妥協姑息外交，是有限度的。美國初期想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有既定原則的。吾人不應誤認美國從亞洲撤軍和外交姿態，為其放棄亞洲的前聲。誠然，美國不願付出陸軍地面作戰的代價，而軍經援助與核子傘政策已是明確無疑了。亞洲國家，必須有適應國際政治彈性的魄力和準備。例如我們不能避免國際間討

論「兩個中國」的辯論，也不能避免保護聯合國席次的苦惱。問題是要先行考慮，我們容忍的彈性尺度頂點在那裡。國際間今天的朋友或敵人，也許就是明天的敵人和朋友。今天遭遇逆流，明天可能迎接順流。一個國家，不能意氣感情用事。任何國家最怕的，是被孤立或自求孤立。以上幾段話，是開場白。現在可談談亞洲國際轉變的本題。

近世亞洲國際政治轉變的背景：在西方船堅礮利和秘密外交未到東方來之前，東亞的國際關係是很單純的。東亞只有唯一的中國是強國，並且中國採閉關自守的農業立國精神，且用萬里長城和諸小邦朝貢制度，維持其「王道」國防政策。日本之對中國，乃一仰慕而閉關的小鄰。但近世紀以來，帝俄漸次伸入遠東，變成中國、日本的強鄰。南亞及東南亞，先後成為西方的殖民安地帶。而美國在一八九八年前，在東亞採取沒有領土野心和避免武裝干涉的重商主義。降至一八九〇年代日本之維新成果早已能使其富國強兵而開始其大陸政策。故直到抗戰勝利前在東亞唯有中國民族是最受列強壓迫的半死半活「次殖民地」國家。綜言之，除日本外，亞洲似乎為非亞洲人的亞洲。其維持全局安定的錯雜綜合因素造成兩種勢力均衡局面：其一為全亞洲性的列強

間勢力均衡——由英、法、荷、美、日、俄、德等國維繫之，以達到其共同剝削利益和容忍調合之均勢。其二為中國大陸上的小勢力均衡——由所有不平等條約之訂約國及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之劃分而維持之。柔弱的中國似賴於「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求苟安。八國聯軍前後，復有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以延續而穩定中國大陸的局面。證諸史實，遠東方面局勢之轉變，多與中國有關。其重要之國際政治轉變，多操於列強之間的互忌或協調。如甲午戰爭之後，列強迫使日本交還遼東走廊。一九〇二年之英日防俄軍事協定，促成日本大膽走向日俄戰爭，使中國備受其害。美國為顧及菲律賓之安全及其在東亞的發展利益，乃調停日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列強，多集中於防止日本在東亞及在中國擴張。例如他們對日本二十一條件之反對立場及華盛頓會議之防日目的，以希用九國公約及四國協定來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和太平洋區域的不設防希望。然由於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世界經濟恐慌，一九三〇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和日本的姑息主張，乃導致了日本採行的「東亞共榮圈」和納粹主義在歐洲的猖獗。也可說日本首次想破壞列強在東亞和中國所建立的大小兩種國際勢力均衡。我們應向歷史學習的是：日本和德國的猖獗，終於毀滅他們自己。民主國家的反擊力量，是龐大無限的，民主國家要改變外交政策，是非常容易的，並為敵人所不可計算預測的。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對南韓政策的改變，即另一好例。

第二次大戰後亞洲國際政治轉變的新局面：日本投降後，遠東只要兩個半強國——美國、蘇俄、和將強而未強的中華民國。我們的國際地位和國力，因軍閥內戰和對日抗戰，消耗太多。美國因不了解中國內部發展而造成其外交上有史以來的最大失敗，使其寄望於中華民國以維持遠東和平的美景遭遇慘敗。凡了解美國外交及閱讀其檔案的學者，都不會否認筆者的結論。戰後日本在遠東國際政治的影響完全消失而處於被改造被佔領地位，東南亞、南亞區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於一九四五年後邁向獨立自主的新興國家路程。故遠東國際局勢一時混亂不堪，陷於動蕩危機狀態。不料韓戰突然改變了美國的暫時觀望政策，使美國迅速的採取了下列諸重點政策：動員軍事力量維護南韓，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一九五一年訂立美菲軍事安全協定，一九五二年結束對日佔領，並同時簽定美日共同安全條約，一九五三年訂立美韓共同安全防衛，一九五四年簽署中美安全協定，同年組成東南亞公約，於韓戰期間並大量協助亞洲民主國家之軍事國防與經濟建設，並援助慘敗無望的法國在越南掙扎作戰。綜言之，凡此諸重點構成了美國近二十年來在太平洋東岸的軍事圍堵政策任務。吾人可以學習者，乃韓戰教訓了美國強化其亞洲政策，使週期性的旋律，繼續強化，並保持已達二十年之久，而今天仍繼續在維持其對各共同安全條約的固定任務。在韓戰以來的二十年中，許多新的因素，參加了東亞國際政治的變化轉進：例如一個強壯的日本經濟大國已長成，中共與蘇俄已有十餘年的

衝突惡化，中共與印度已由友好趨向戰爭敵對，中南半島戰火不息，印尼由混亂邁向反共的軍人執政，臺灣有土地改革與經濟建設成果，南韓由貪污無力走向朴正熙的輝煌革新發展……等。但是筆者認為使東亞國際局勢動蕩轉捩的最重要因素為下列三點——其一為美國在越戰中的持久不勝不敗政策。其二為毛林公開外銷其「人民戰爭」的理論和政策；其三為越戰在美國民主政治上所造成的後果。

綜言之，國際政治瞬息萬變，變是常態。在國際政治上敵友難分。所不變者，乃一國的基本利益和立國精神，由此兩端可深入研究一國的對外政策。任何政府在維護國家利益上應適應變的原則，了解變的理由，別的國家變，自己也變，凡能開擴自己國家的防衛與其他利益的變化方法都是對的。國際上的道義觀念，只是一種外交辭令和宣傳工具而已。中國有句老話：「窮則變，變則通」，此亦可用於國際政治上的。變亦即筆者前面所說的外交彈性。彈性愈大，則絕對性的成功或失敗亦愈不明顯。但是運用外交，或玩弄外交戰術的機會即相對因彈性而增加。例如筆者覺得國內輿論對我們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追蹤的太緊，分晰的太單純，看的太狹隘。似乎給讀者一個結論：如果我們失去了聯合國的代表權，或部分的代表權則一切都絕望了。或者是如果能保留此代表權，則一切都成功了。這顯然是牛角主義的自我虐待。要知道聯合國不是一個真正維持世界和平或任何正義的機構——牠只是國與國之間利益衝突、調合、或表達的另一公開方式之一

而已。是一個隨時因票數而表達偏見的組織罷了，例如聯合國曾經不許西班牙參加，但卻讓蘇俄享受三票代表權。蘇加諾曾生氣而退出了，但是印尼新政府一九六五年以後又參加進去了。凡此對各該國，並無重大損益。

美國二十年來在亞洲的圍堵政策，幾乎絲毫未變。那是由於其富強，而人民都是反共的。但是美國內部的政治因素及越戰的失敗，終於促成了尼克森主義的全球性新外交戰略。美國的新外交政策針對亞洲國際的許多矛盾與衝突：例如（一）中共與蘇俄的衝突，不但永遠不會消滅，甚而要更形惡化，唯形式或許有變。但在國際政治上（除非能有美國與加拿大式的密切歷史關係），兩大隣國之間一定互相忌妒，爭雄鬭爭。過去英法之間是如此，德法之間是如此，將來中國與印度之間可能亦如此。所謂「東風勝過西風」，也許就是這個意思。（二）美國與蘇俄在亞洲的利益，將會有部分共同利害關係，故其在外交上將可能有協調互利的傾向。以「談判代替對抗」，就是尼克森外交的一個新的動向。（三）亞洲國家在七十年代將面臨一嚴重選擇階段，不能再一切都靠美國了——日本將作此一選擇，其影響將涉及整個東亞其他東南亞國家，亦必作此決定，中立政策的機會是有限了。各國都要面對現實，有的移向左方，有的或轉向右邊，其後果將構成一新的國際局勢。這新的局勢，能否維持長久，當會造成更多的轉變。

綜言之，不管怎樣變化，沒有一個超級國家會離開亞洲的。在中共與蘇俄的衝突中，蘇俄很

難讓中共進展無阻的深入東南亞。並且美國、英國對許多東南亞國家有直接的條約防衛責任。中共的向外伸張，不但有礙日本的國防安全考慮，在東南亞也有礙日本的商業投資保護。日蘇與日美之間的外交決策，將關係整個亞洲的新勢力均衡局面，並有安定大局的決定性。中共內部之政治轉變，將會造成其外交策略的改變。東南亞反共國家的大同盟之迅速形成，更能積極的影響大局之轉變。凡此諸端皆足以說明亞洲國際政治，不是凍結的。任何國家，都有幾張活動的王牌，和防衛本身安全的佈署。最要者，在一九七〇年代，我們將更進一步的發現亞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力量和外來的反民族主義思想，將展開一高度白熱化的鬭爭。另一方面，所有東亞各國在一九七〇年代，將因日本在亞洲的東山再起，而引起各種心理上的，情感上的，商業經濟上的，及國防安全上的各種考慮和恐懼。此種反應，淵源於日本二次大戰中的劣跡昭彰和欺騙侵略。各國的此種懷疑，與恐懼，無寧說是日本今後亞洲外交的最大障礙之一。日本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另一困難，為其國內社會主義勢力及其國會席次的消長。尤其是左傾力量對日本外交所加施的壓力。凡此將影響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解釋或修改，以便日本在建軍自衛上，得到合法的根據。凡我亞洲民主國家，不應優望日本能迅速變成一反共堡壘，而共產國家，指摘日本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更是狂妄胡說。因為今天的新日本，既不會恢復其「東亞共榮圈」的幻想，更不願作任何西方國家的「走狗」。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亞洲，由於美軍地面部隊的撤退和嚴禁類似越戰的軍事行動，亞洲各國間的區域性組織發展、合作等，將有突飛猛進的可能。這樣，將使以亞洲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發展，更形具體化，也將是對亞洲國家的嚴重考驗。在另一方面，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將受阻礙，因為部分的財政資源預算，將自經濟開發和社會建設等方面，移到國防整軍的措施。經濟發展的延緩，對新興國家的開發，是一種不幸。綜言之，由於英法荷之退出東南亞，蘇俄之難於在東南亞採取任何明顯企圖，及美國對亞洲防衛的減縮，亞洲國家對亞洲的事務及命運的決定，有了更有力量的影響力。但亞洲的和平與戰爭，在一九七〇年代，並不操在各亞洲國家的手裡。

如果要對以上的敘述作一結論，筆者認為：其一確定亞洲的未來和平與戰爭，將來自中共內部各種變化及其對東南亞的政策，與我們中華民國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反攻大陸，尤其是對東南亞一帶。其二、由於民族主義力量的膨脹，無論是過去的日本或今天的中共，都無法成功的執行擴張侵略主義。其三、亞洲的諸小國不願意接受，而且美國、蘇俄亦不允許任何東亞大國（中國或日本）採取亞洲門羅主義。故在經過一個混亂，戰爭時期之後，亞洲的國際政治，將再走向一個較為穩定的勢力均衡狀態，然後才能發展到更較理想的區域性合作。其四、亞洲在一九七〇年代，將進入一段極不穩定的時期，並且充滿着各種衝突與矛盾，無論其存在於日俄、美蘇或其他各國之間。